

民国时期的 传染病与社会

——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

张泰山 著 | Infection and Socie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民国时期的 传染病与社会

——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

Infection and Socie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张泰山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 / 张泰山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9
ISBN 978 - 7 - 5097 - 0343 - 4

I. 民… II. 张… III. 传染病防治 - 研究 - 中国 - 民国
IV. R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7892 号

张泰山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HING SCIENCE & ACADEMIC PRESS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理由	1
二 对“传染病”概念的界定	5
三 研究现状回顾	6
四 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25
第一章 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概况	27
一 民国以前传染病流行简况	27
二 民国时期法定传染病种类	42
三 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概况	50
四 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的特点	50
五 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的原因	69
六 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对社会的危害	82
第二章 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时的救疗措施	99
一 成立应急防疫组织, 指导救疗事宜	99
二 调查疫区传染源, 为救疗提供依据	111
三 管制交通, 隔离患者	115
四 实施应急预防接种, 清洁消毒与除灭害虫	127
五 建立临时医院, 收治患者	139
六 救疗中的宣传	149

第三章 民国时期政府预防传染病的措施	158
一 建立传染病防治机构	158
二 颁布防疫法规, 实行疫情报告制度	176
三 强制预防接种, 提高人群的免疫力	197
四 实行交通检疫,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216
五 宣传和普及传染病预防知识	239
第四章 民国时期传染病与公共卫生建设	258
一 时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	259
二 环境卫生的改良与建设	271
三 学校卫生运动的推行	299
四 农村公共卫生建设的开展	312
五 培养公共卫生人才	334
结语	346
附录 民国时期疫情年表	364
主要征引及参考文献	495
后记	510

绪 论

一 选题理由

对于这一选题的最初兴趣萌发于2003年5月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后的复试期间。其时正是“非典”肆虐神州大地,以致我们的复试只能通过邮寄材料进行。虽然逃过严厉的面试关,由此却产生了一些想法:历史上发生过如此猛烈的传染病吗?情况如何?其时政府和社会是如何应对传染病的?它又具有怎样的启迪?入学后,开始有意识地接触这方面书籍和材料,后在导师的鼓励下确立了这一选题。确立这一选题,还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理由。

其一,关爱生命与健康是历史学者应有的情怀。在历史上,疾病特别是其中极具威胁性的传染病是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大敌。它不仅给生命个体带来了难以尽述的痛苦和恐惧,而且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制造了种种障碍和灾难。人类也以各种方式不断地与传染病进行抗争。从20世纪开始,随着多种疫苗和特效药物的开发和使用,在表面上传染病带来的威胁似乎降低了,人们对其关注程度也有所下降。然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很多病毒在以极快的速度变种,同时,它们还拥有众多的帮凶——贫困、无家可归、气候异常和免疫疲劳等等,所以对人类极具威胁的传染病不会轻易地消失。时至今日,仍有肺结核、疟疾、麻疹、痢疾、艾滋病等传染病依然威胁着人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与生命。特别是近几年“非典”、禽流感等相继出现,它警示

人们必须对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的传染病给予高度的关注。

生命的存在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学术理念和现实中,往往缺乏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关怀^①,因而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传染病自然就成了历史学的“漏网之鱼”。然而,诚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②因此,作为历史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去呈现和透视历史上与人类生存环境和境况息息相关的传染病。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且有利于我们真正了

① 例如,台湾学者杜正胜发出这样的追问:“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或人群,不论古代的或现代的、本国的或外国的历史现象大概皆无异议,以往的史学主要领域,譬如政治史、军事史、制度史或学术思想史,可以说都离不开人或人群,然而如果仔细追究下去,我们不免疑惑,‘人’到底在哪里?”由此他主张历史学的考察应从“生命开始”,以生命为主轴,以社会和文化为重心来探讨一个社会对生命的解释和维护生命的方法(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第8卷第4期,1997年12月,第143~145页)。这也正是他在1990年代以来,在台湾史学界倡导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最初意图。大陆青年学者余新忠等也指出:在我们整体的社会理念中,缺乏对生命的真正关怀和珍视,表现在学术上,是学者们往往热衷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或者历史规律的探寻,而轻视历史细节,忽视人的生存境况等等;在现实中,片面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而较少能真正体认到“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的道理(余新忠等:《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第4页)。

② [美]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339页。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阐明了生态、人口、政治、文化以及宗教等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用“巨寄生”(macroparasite)与“微寄生”(microparasite)的理论,解释自然社会环境—人类—微生物之间的生态平衡。他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人类历史上的互动关系比喻为“巨寄生”的关系,而把人与病原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比作“微寄生”的关系。作者认为,作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人类总是在不断地捕食与被捕食中求得生存,人类历史正是在这两种寄生关系中艰难发展。人类的活动和致病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是共生互动的,人类小范围的活动如衣食住行,大范围的活动如跨洲战争等不但能够影响传染病的发生以及发展,反过来传染病也能影响人类的各種活动。

解历史上的生命,从而培养我们关注生命、珍视生命的意识。

其二,人类与传染病的交锋有着漫长的历史,深入了解和认识人类以往与传染病斗争的相关经验,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过于侧重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阶级斗争以及制度和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而把与人自身最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人类历史中最真实、最具体的内容,几乎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虽然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历史上人们的衣食住行开始受到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对直接关乎人之生老病死的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仍未引起史学界相应的注意。可喜的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中期开始,受国际史学界自1970年代兴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的影响,中国台湾和大陆史学界相继兴起了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①。目前,在台湾史学界,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已成为主流史学一部分;虽然在大陆史学界,它基本还是一个较少人注目的非主流的领域,但它的兴起必将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显现出对人生的关怀,因而它是一个兼具方向性和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这无疑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从目前史学界对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情形来看,学界对疾病医疗史的关注最初往往是从传染病切入的,因此,探索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既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这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传染病对人类的侵害还是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传染病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如果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上的传染病,去再现历史上人们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民众心态、环境与社会变动,特别是人类在与传染病作斗争时所采取的措施、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等等,这些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轨

^① 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迹,而且对于唤醒公众意识,促使人们对传染病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对推动相关知识的普及,防患于未然,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其三,研究民国时期的传染病,有助于从另一个视角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瘟疫、战争、灾荒被称为制造人类历史悲剧的“三剑客”^①,它们时常并驾齐驱,肆虐于人间。民国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时间,但同样遭受了传染病、战争、灾荒的洗劫。在国内史学界,对于民国时期的战争,从来比较重视,著述也颇丰;对于民国时期的灾荒,随着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它也成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的论题,虽是“迟到的繁荣”^②,但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③。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有助于了解

① 梁峻、孟庆云、张志斌主编《古今中外大疫启示录》,人民出版社,2003,第110页。

②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第15页。

③ 有关民国时期灾荒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在资料方面主要有:李文海等编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20~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中国红十字总会编写的《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等;在专著方面主要有: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李文海等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等;在论文方面主要有:王方中的《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水良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斗争》(《历史教学》1982年第12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三次大灾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吴德华的《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3期],孙语圣的《民国时期安徽灾荒成因浅析》(《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池子华、刘玉梅的《民国时期河北灾荒防治及成效述论》(《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池秀梅的《民国时期福建灾荒的社会成因探析》(《龙岩师专学报》2005年第1期)等。此外金双秋的《中国民政史》(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敖文蔚的《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民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王振忠的《近600年来的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等,对民国时期的灾荒、救荒等问题也有论述。在这些资料、专著、论文中时有涉及传染病方面的内容,为本书的写作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和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然而,与此相反的是,民国时期频发的传染病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没有受到史学界应有的重视。个中原因,一是有关传染病的史料相对较少且相对分散,传染病的发生本身又不具规律性,容易为学界所忽视;二是在我们的学术理念和社会意识中,缺乏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关怀;三是史学工作者专业医学知识缺乏而产生的阻力。此外,还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长期以来我们把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反动政府”,认为它们对广大人民的健康是漠不关心,对人民的生老病死是从不过问^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史学工作者对民国时期疾病医疗问题的涉及。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民国传染病史研究成为一块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民国社会的面相,从而增强历史解释的维度和力度。

二 对“传染病”概念的界定

按现代医学的解释,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的疾病”。与其他疾病相比,传染病具有四个基本特征:有病原体(包括微生物与寄生虫);有传染性(病原体能通过某种途径感染他人);有流行病学特征(在质的方面有外来性和地方性之分,在量的方面有散发性、流行和大流行之分);有感染后的免疫^②。其中,根据发病的缓急、病程的长短等情形,可以分成急性和慢性两类^③,人们常将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称为“瘟疫”^④。本书所研究的传染病病种是指北洋政府

① 如北京医学院医史学教研组、保健组织学教研组编写的《北京医药卫生史料》(北京出版社,1964)中的前言及第1章,就是如是说法。

② 彭文伟主编《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第1、9页。

③ 余瀛:《急性传染病》,科学普及出版社,1965,第5页。

④ 王永清主编《拒绝传染病》,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3,第7页。

在1916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和1944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条例》中所规定的传染病病种，即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痢疾、斑疹伤寒、猩红热、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回归热等10种法定传染病，以及在实际运行中需要报告的两种指定传染病，即疟疾和黑热病。这12种传染病均属于急性传染病范围。故本书所指传染病，除另有说明外，专指这12种传染病（详见第一章第二节）。

三 研究现状回顾

（一）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①

对于“疾病医疗社会史”这一名称，学界尚未取得共识，诸如称之为“身体史”、“医疗社会史”、“人群生命史”等等。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疾病医疗社会史是以生命为主轴，以社会和文化为重心来探讨一个社会对生命的解释和维护生命的方法，故而也将其称之为“人群生命史”。它所体现的是“历史、社会现象和文化意义”，不同于一般的医疗史研究，是“借医史课题或从医史资料来认识社会面貌，把握文化特质，重点是一般的历史研究，不限于专业医学史的范围”，因而它是“医疗史和社会史的交集”，故杜氏又将其形象地称为“另类医疗史”^②。大陆学

① 本小目主要参考余新忠的三篇学术综述文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参见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第6卷第1期，1995年3月；《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第8卷第4期，1997年12月。

者余新忠吸收了杜氏的观点,认为疾病医疗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的疾病、医疗及相关问题,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注的不是疾病医疗的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切入点,借此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①。

随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医学社会学或健康社会学的兴起,特别是1960年代以后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受其影响,西方史学界在进入1970年代后,开始注目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这一转机出现的重大标志是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教授的《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一书的出版。对麦氏的贡献,英国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教授曾评价道:“他(指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合并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②以此为嚆矢,探讨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以及借此透视社会和文化的医疗社会史乃至身体史研究,遂成为当今世界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并业已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

受这一史学思潮的影响,国际中国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涉足中国历史上的疫情研究。到目前为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三篇论文二本专著。三篇论文是:美国学者邓海伦(Helen Dunstan)在1975年发表的《明末时疫初探》,澳大利亚学者费克光(Carney T. Fisher)在1995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鼠疫》,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张宜霞、伊懋可的《近代中国的环境和结核病》^③。二本专著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

① 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转引自陈秋坤《人类造就了传染病——介绍麦克尼尔教授新著〈传染病与人〉》,载陈胜昆《中国疾病史》“附录”,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第251页。

③ [美]邓海伦:《明末时疫初探》。该文集探讨了明末发生在山西、直隶、山东、浙江的传染病疫情及其影响。后两篇论文,收录在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下(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转下页注))

的《中国 19 世纪的腺鼠疫》，日本学者饭岛涉的《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①。

大约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和 1990 年代中期起，受到世界史学潮流的影响，在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史学界也相继兴起了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从目前总体研究情况来看，在研究时段上，海峡两岸的研究主要是在中国古代史，尤其集中在明清时期，对民国时期涉及甚少。这可能与研究者大多是从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出身有关。在研究成果上，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大陆学界离台湾学界还有一段距离^②。不过在大陆疫病史研究中也不乏上乘之作，如余新忠的专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便是一例，史学家冯尔康称其为“我

（接上页注③）所，1995，第 673～745 页、797～827 页）中。费氏的文章认为自 1800 年以来腺鼠疫一直在中国流行，而此前在欧洲暴发的黑死病与中国同期流行的鼠疫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通过对 1894 年香港鼠疫和清末东北鼠疫的探讨，认为中国政府赞同以西医作为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从而为现代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奠定了基础；张氏和伊氏的论文，以民国时期的上海、北京和天津为例，探讨了结核病流行与环境因素的关系，认为结核病流行与职业、室内活动时间的长短、拥挤的居住条件、饮食习俗和随地吐痰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

① [美] 本尼迪克特的《中国 19 世纪的腺鼠疫》（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对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源起、鼠疫沿着商路在内陆地区的流行、东南沿海地区鼠疫的空间传播方式、19 世纪中国各界对鼠疫的反应、1894 年广东与香港的鼠疫、清末东北的鼠疫与国家医学的兴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她认为 19 世纪末中国有关鼠疫的历史图像不单是生物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因此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业是十分必要的。[日] 饭岛涉的《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东京，研文出版社，2000），通过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早期一系列鼠疫疫情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应对措施论述，探讨了中国政府是如何在实现近代化这样一个大目标下，不断地介入医疗卫生领域而逐步推行卫生“制度化”的，并指出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城市和部分乡村。

②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请参见余新忠《20 世纪以来明清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10 期；《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国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①。值得指出的是,1980年代以来,大陆医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也显现出更丰富的研究取向:除疾病自然史、疾病观念史之外,疾病社会史以及疾病文化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如近年来张志斌、马伯英、李经纬、陈乐平、廖育群等学者在其研究中表现出了对社会因素相当的关注^②。此外,在大陆的文学界、翻译界等领域也表现出对疾病医疗乃至身体史的注目。如林志明的《苦难不在人间》(花城出版社,1999),作者以亲身的经历描写了麻风病人在旧中国的苦难经历和新中国在防治麻风病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余凤高的《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作者把疾病、医学与文化、文学、历史联系起来,形成一条新的理解疾病的思路。这些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界乃至社会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总之,上述学界研究的新趋向,不仅有助于推动医学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和深入,而且也有助于人们全方位、多维度地审视健康、疾病及其与当时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以下立足于民国时期疾病史,结合医疗史,分别对以往医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

(二) 医史学界对民国时期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回顾

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被认为是医史研究中较薄弱的的一个环

①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序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② 如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因素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李经纬等《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节,而民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在这一环节中显得更弱^①。尽管如此,医史学界还是做了许多工作,使得民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面将20世纪以来医史学界对民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分三个时段^②作一回顾。

其一,1949年前的研究。由于现代中国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是与中国医学史研究相伴出现的,或者说是附着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之中,而且最初的疾病史研究基本是通史性的研究。这一时期最有代表的通史性成果,是陈邦贤先生在192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第一部医学史——《中国医学史》(后又二度增改)。特别是陈老在该书第二版(1937年)中,将“疾病史”专列一篇进行论述,其内容几占全书的1/3,其中以对传染病的探讨最为详细,提出并加以说明的病名达18种之多^③,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重要传染病。这一方面是他所提出的“晚近世界研究医学史之问题,可分为三大类,一关于医家地位之历史,一为医学知识之历史,一为疾病之历史”的学术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关注。同时,陈老在疾病名称等方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专列参考书目,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较大的方便^④。

① 参见李经纬、张志斌《中国医学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斯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陆肇基《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7年第1期。

② 这一分期方法主要参考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大陆杂志》第95卷第6期,1997年11月)以及余新忠《20世纪以来明清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中的分期法。

③ 它们分别是:伤寒、发疹伤寒、霍乱、痢疾、天花、麻疹、水痘、白喉、猩红热、鼠疫、肺癆病、梅毒、麻风、疟疾、黑热病、血吸虫病、姜片虫病、肺蛭虫病。参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重印,下同,不再另说明),第366~385页。

④ 关于陈邦贤先生三次创作的情况及其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请参见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

王吉民、伍连德的《中国医史》(1932年)虽然没有专门的疾病史章节,但对近代流行的主要疾病如天花、鼠疫、霍乱等均有较翔实的记载,特别是伍氏作为我国近代医学界的重要人物,曾领导过鼠疫防治、海港检疫等工作,书中保存了许多重要史料。

除了附在医史著作中的疾病史研究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种疾病的单篇论文,其中对传染病,特别是对近代以来给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鼠疫、霍乱、结核病、猩红热、回归热、斑疹伤寒、疟疾以及黑热病等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疾病。如,伍连德等人对鼠疫的研究^①;关任民、俞凤宾等人有关霍乱的研究^②;余云岫和李涛等关于结核病的探讨^③;林家瑞和陈方之等人对猩红热的探讨^④;魏曦、马龙瑞对回归热的研究^⑤;从1931年开始,张汉民、罗忠等人对斑疹伤寒进行研究,并取

① 伍连德:《1917~1918年山西疫症流行沿革》,《中华医学杂志》1919年第3期;《鼠疫预防之总论》,《中华医学杂志》1929年第2期;等。

② 关任民:《哈尔滨霍乱之防治法》,《中华医学杂志》1920年第1期;俞凤宾:《霍乱治疗要旨》,《中华医学杂志》1926年第3期;伍连德:《上海之霍乱》,《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7期;余云岫:《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3年第6期;巴吕德:《上海霍乱流行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44年第4期;等。

③ 余云岫:《中华结核病变迁史》,《中华医学杂志》1924年第2期、《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华国》1924年第11期;李涛:《中国结核病史》,《中华医学杂志》1939年第12期;等。

④ 林家瑞:《远东猩红热的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26年第2期;余云岫:《猩红热旧说之回顾》,《新医药》1934年第2期;余云岫:《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5期;樊培禄:《猩红热之预防》,《中华医学杂志》1938年第9期;陈方之:《猩红热的现代观》,《新医药》1934年第2期;陆渊雷:《猩红热的传入》,《国医导报》1941年第2期;关任民:《猩红热在吾国之考察》,《中医医学报》1930年第7期;等。

⑤ 魏曦:《我国之回归热病》,《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7期;马龙瑞:《滇西茶叶阱之回归热流行概况》,《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7期;等。

得一定的成绩^①；张理觉、姚永政等人对疟疾的调查与研究^②；从193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钟惠澜、冯兰洲、孙志戎等人对黑热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③。此外，还出现一些有关传染病的综合调查与比较研究，如朱森基对1932陇海铁路霍乱发生的原因、传播途径以及防治经过进行详细记录和研究^④；1935年卫生署曾组织204家医院对住院及门诊病人进行19种传染病寄生虫病的调查^⑤；1941年范日新对当时法定的十种传染病流行资料的整理^⑥；1949年郁维对上海法租界抗战前与战时传染病流行的比较研究^⑦。上述调查与研究虽然大多数属于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流行病学史的研究，但这些成果不仅有利于当时防疫工作的开展，

① 张汉民、罗忠：《中国北部斑疹伤寒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35年第1期；罗忠：《斑疹伤寒之流行情况》，《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7期；朱师晦等：《安顺所见五年半以来之斑疹伤寒》，《中华医学杂志》1946年第11、12期；谢强哉等：《贵阳斑疹伤寒之流行病学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46年第11、12期；等。

② 张理觉：《京沪路疟疾调查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935年第5期；姚永政等：《瘴气病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2期；应元岳：《疟疾问题之检讨》，《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7期；吴文华：《滇省勐定瘴气之概况》，《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8期；陈国忠：《福建之疟疾》，《中华医学杂志》1942年第12期；郭景升：《贵州疟疾调查之初期报告》，《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1945年第2期；等。

③ 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寄生虫学系：《防治苏北黑热病之经过概况》，《中华医学杂志》1935年第2期；孙志戎等：《中华白蛉之黑热病鞭毛体天然感染》，《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2期；徐辄：《黑热病》，《中华医学杂志》1939年第6期；何博礼：《中国黑热病流行病学之检讨》，《中华医学杂志》1940年第8期；何观清：《西北黑热病流行病学之概要》，《中华医学杂志》1948年第7期；等。

④ 朱森基：《陇海铁路防疫之经过》，《医药评论》1933年第2、3、6、9期。

⑤ 参见许世瑾等《十九种传染性疾及寄生虫性疾调查》，《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8期。

⑥ 范日新：《中国1939~1944年十种法定传染病流行史料汇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1941年第5期。

⑦ 郁维：《上海市旧法租界战前与战时传染病流行情况比较》，《中华医学杂志》1949年第2期。